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

经济转型的关键在于推进改革



王一鸣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从 2011 年起,中国经济连续 7 个季度增速下降。既要保持一定的稳步增长,又要实现经济转型,这就需要寻找中国未来一个时期增长的新动力。

“中国的经济增速不会长期下降,虽然回到以前那么高已经不可能了,但中国有优势能够把高速增长延续下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

这些优势,包括中国内需市场还没完全开发,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没结束,但要把这些优势彻底发挥出来,寻找对未来增长新的动力和机制,王一鸣说,从供给面上来讲,一定要跟研发、创新、人力资源投入、制造业的重组、结构的调整有机地结合起来。

当前,中国传统的发展方式面临转型的巨大压力,首先是外部环境正在发生变化;金融危机以后外部的需

专访中国工程院院士邬江兴:

智慧城市的核心挑战来自管理体制



邬江兴
中国工程院院士

智慧城市的核心挑战,来自管理体制。邬江兴说,智慧城市建设中,存在很多问题,我注意到你曾经说,建设智慧城市难点不在技术,而在利益壁垒,该如何理解?

邬江兴: 硬盘和中国的运行体制有关,政府各个部门都有大量信息,但这些信息都被政府的各个部门所拥有,所谓智慧就是把把这些信息最大程度地融合起来,才能有智慧。单个的交通信息,可能会导致安全信息的修订,燃气的供应可能需要我们调整能源配给的情况。所以数据

正在大幅度地收缩,传统的东亚制造、中国制造,通过欧美消费市场这种分工关系正在发生变化。而后起的新兴国家对中国市场的替代效应也在显现。同时中国的内生条件也在发生变化,高储蓄率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储蓄率也会趋于下降。

转型的关键还在于推进改革,改革的目标应该是更加开放、更加自由、更加富有竞争性的市场经济模式。

而要实现转型,王一鸣认为有两个切入点,一是创新,一是培育新的产业领域。创新最关键的是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要逐步地恢复,要走出逐步放缓的态势,要对企业研发大力度地推进。“中国企业一定要从传统的制造走向以研发为基础的制造,才能根本地走出目前的状态。”

关于培育新的产业领域,王一鸣认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和医药产业以及新能源,可能是未来需要进一步强化和突出的领域。但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市场培育,目前面临很多制度、体制、机制、政策的变革。同时也要注意,战略性新兴产业不能搞成加工组装模式,变成新的代工,而要跟创新、研发有机地结合起来,要掌握核心技术。

王一鸣认为,转型的关键还在于推进改革,改革的目标应该是更加开放、更加自由、更加富有竞争性的市场经济模式。其中重要的环节,就是政府职能的转换。他认为,现在政府推动的模式,虽然有积极的方面,但暴露出很多问题,比如政府定项目,政府间过度的竞争,依靠大规模投资,而不是依靠研发创新来驱动,不必要的补贴等等。

“当前的这种形势,为推进改革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窗口,因为我们面临很多约束的强化,而且十八大召开以后,一定会更大力度推进改革。”



getty 图

都是相互关联的,如果你把它隔开,合起来的意义就没有了。一个数据描述一件具体的事,但是若干个描述综合以后就会产生新的知识,所以只有在数据融合过程中才能创造具体的知识,有知识才能谈智慧,所以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些数据综合起来使用。

邬江兴:肯定有地方特色的,是需要保护的,怎么在一个共享平台上,能保护地方特色,这又给云计算提出了新的要素。所谓的方特色,比如各地政府有它的制度,这个高速公路不收费那个收费,另外各地发展速度不平衡,东西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表现,也要在共享中把不均匀性体现出来,目前我们的架构还有缺陷,技术上我们还需要改进。

邬江兴:当然是机遇,政府把信息都释放出来,基于这些信息的增值服务,对企业来说有很多机遇,许多中小型企业可以发布它的一些服务,比如,你今天出行,交通助理给你安排好行程表,数据公开了,在数据中寻找商机就是你的本事。

如果数据开放程度不加限制的话,就不存在民企和国企的差别,这不像传统产业,因为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它以前也拿不到这些数据,只是可能说国有企业的技术开发能力强一些。

的霍德支持民主党,和脱氧核糖核酸一样让他津津乐道的是,飓风“桑迪”吹倒了共和党的墙头草——比如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他近日一改之前对奥巴马的反对立场转而称赞其应急指挥能力)。

中国 R&D 的潜力
第一财经日报:2011 年,中国的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 8687 亿元,增长 23%;经费投入强度(与 GDP 之比)为 1.84%。作为一项比 GDP 更能反映一国软实力的指标,你如何评估其绝对数量和相对比例?
霍德:中国近年来的大量投入已经在夯实这方面的基础,但你不能指望半年内就解决问题。可以肯定的是,举力增加 R&D 的投入有助于科技商业化的应用和经济增长。

霍德:发达经济体的 R&D 投入强度是一个怎样的水平?
霍德:没有一定之规,我认为理想化的比例应该是 2%~3%,美国常年来的水平大约是 2%。
日报:你在哪些领域看到了中国科技创新的进步?
霍德:中国人在夯实科技研究方面的成就令人瞩目,比如在生物技术以及医疗保障等方面的投入,你们也从美国实验室挖回了很多人才。

现在这块地将研发投入于企业的能力,即科技商业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你们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和资源,还要有更多的 CEO(首席执行官)储备,要有更多人力资源投入于企业研发领域,在企业科研领域,同样需要风投融资。

医疗保障的普惠性
日报:OBAMA CARE(美国总统力推的医疗改革)已经成为美国人的热词,中国也正在夯实医改的阶段性成效。在医疗保障方面,两国是否有互相学习、汲取之处?
霍德:美国医改的核心要义在于将惠及数百万没有医疗保险的民众。对于一国政府而言,为贫困民众提供医疗保障是一个必需的“托底”责任。中美都如此。我并不是特别了解中国的医改政策,但我认为,对于旨在建设一个为民众提供均等机会的现代社会的国家而言,医疗保障是一系列政策组合中的核心问题。

霍德:最近我向有关方面推介了一个生物科技项目,这个与人类基因组计划规格相当的项目在生物学的角度研究涉及器官活动的蛋白质表现。目前的估算,人类基因组计划创造的前期投资为 35 亿美元,创造的社会效益可能达到 8000 亿美元,这是一个极高的收益率。

的职责也是挑战所在。如果奥巴马委任了,我们再来评估我说的这个新项目。

科学家和政治家
日报:你说到中国在一些领域的科研应用方面还有所不足,而我看到西方国家似乎在这个方面存在过度商业化,比如医药企业在新药产品前对于政府的游说,这往往是利润最大化导向的。

霍德:这是一个普遍的挑战,我们要做的是保持独立判断不受干扰。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OMB)在这方面监管颇严,作为美国的预算审批机构,OMB 在投资流向方面掌握着相当大的话语权。

我认为,游说是政治的一部分,你需要去面对它而不是消灭它。有时候,游说者的贡献很大,比如美国医院和制药巨头曾对艾滋病的一项药物治疗方式坚决抵触,但部分人的游说最终让这项治疗惠及患者。

霍德:我认为自己的贡献“无用”可图。作为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院士,林奎斯特现任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也许是浸透上海交大校区周边许久的,他还和本报记者分享了他所知道的中国古代数学家徐光启及其家乡徐家汇的故事。

中国的信息驱动渴望
第一财经日报:从国家对科研投入的增长来看,你是如何评估的?
林奎斯特:中国对科研的投入有大幅度的增加,年增长率 20%-30% [注:国家统计局、科技部和财政部的统计公报显示,2011 年,我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 8687 亿元,同比增长 23%],我想这样的增速比起西方国家来更为迅猛。我能清晰地看到,中国非常期望成为一个知识驱动(knowledge driven)社会,也想成为知识驱动经济体。

霍德: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大科学”——投资浩大的系统科研项目。美国联邦科研机构基本关注的都是“小科学”,这意味着我需要到联邦政府游说“大项目”。所以,我认为这些都会是科学研究过程中必须经过的流程。因此,我享受这样的政治与科研之间的互动。这中间也会出错,但整体来说是产生正面量的。

日报:所以在美国,要想当好科学家先要照顾祖国山会?
霍德:不尽然,我觉得大约 95% 的美国科学家更想搞“小科学”,他们可以耳闻不闻政治而纯粹地做好研究。
日报:莫言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对于更多中国本土的自然科学研究者来说,他们与诺奖多远或近?
林奎斯特:你说诺奖?早晚的事。因为这是大势所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超越了日本,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当然,美国无论是在高校资源上,还是在科研环境上都更先进,美国有很多出色的大学。我觉

专访上海交大教授、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院士林奎斯特
学术研究不要被论文指标所裹挟



林奎斯特
上海交大教授,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院士

得中国会努力朝着高校科研良性轨道发展,中国和美国一样,从来不缺天才。

去行政化和去指标化
日报:中国高校一直在探索去行政化之路,你会对中国的大学校长提出什么建议?
林奎斯特:我说一下我觉得该做的事情吧。在中国,指标压力太大,而这些指标往往说明不了多少问题。数字无法衡量你在学术上有无优秀,在中国通常会看你发表了多少篇论文等等,这些是比较容易操作的,一些曝光的面面俱到年轻的科学家错误的引导,这些都不会孕育出正确的科学观念,先进的科学和好的科学家。获得学术承认很重要,但如果为单纯的数字所裹挟,就变得南辕北辙了,会将学术发展引入错误的轨道。

林奎斯特:我想国际学校、国际交流都不错。早在几年前,中国的科学家徐光启就和利玛窦这样的西方人士进行学术交流。如今的徐家汇依然有着这样的历史痕迹。他们让中西方的文化和科学相融合,几何学的引入就是他们的贡献。

日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中外高校融合,比如上海纽约大学。
林奎斯特:我在纽约大学,国际交流很不错。早在几年前,中国的科学家徐光启就和利玛窦这样的西方人士进行学术交流。如今的徐家汇依然有着这样的历史痕迹。他们让中西方的文化和科学相融合,几何学的引入就是他们的贡献。

日报:你如何看待科研应用?

林奎斯特:我的感觉是很多科研似乎都必须和产业产生一点关系,都必须是有用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好的,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有用”?很多突破性的科技后来在成果生之初都不尽有用,其后才显示生命力,知识和发展是在“有用”之前的,如果太“用”是圈的话,就会错过诺贝尔奖和重大发现、发明。

日报:我们说是科研去功利化?林奎斯特:不能绝对化,我想可以对纯科研和产业相关科研以同样的关注,在美国,有很多高校、公立的、私立的,各种研究所,他们资金充裕,但并没有将“有用”作为目标,而是为了深层知识和学术研究。好奇心驱动的研究很重要。

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以及如何开发核能,但他一开始并不认为自己的创造有多少可应用性。但是,难道我们不应该鼓励他的研究吗?“有用”不是科研最基本的道德,当然如果科研成果转化为产业创新力量也是很激动人心的。我想这是问题之一,美国的大学也并没有将“有用的科研”摆在第一的位置。

专访美国总统科学顾问霍德

白宫和实验室的游戏



霍德
美国总统科学顾问

于后者,霍德认为中国还略显不足。和商业化的不足一样,商业化过头也是个问题,这便是个困扰美国等西方国家多年的问题——如何避免少数企业例如制药企业的商业利益绑架公共利益。对此,霍德说,在监管得当的前提下,商业游戏会给公众带来正能量。事实上,除了科学家,霍德本人就是个经常出入联邦政府“跑项目”的游说者。他称,于惠及公共福利的“大科学”(Big Science)研究项目而言,和政客打交道是必修的功课。

作为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 一项上世纪 90 年代启动、旨在揭示人类基因组秘密的多国合作项目)的参与者,专攻生物医学的霍德是少数几个集美国国家科学院、医学院和工程院院士于一身的科学家。他并不只生活在实验室中,78 岁

于后者,霍德认为中国还略显不足。和商业化的不足一样,商业化过头也是个问题,这便是个困扰美国等西方国家多年的问题——如何避免少数企业例如制药企业的商业利益绑架公共利益。对此,霍德说,在监管得当的前提下,商业游戏会给公众带来正能量。事实上,除了科学家,霍德本人就是个经常出入联邦政府“跑项目”的游说者。他称,于惠及公共福利的“大科学”(Big Science)研究项目而言,和政客打交道是必修的功课。

作为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 一项上世纪 90 年代启动、旨在揭示人类基因组秘密的多国合作项目)的参与者,专攻生物医学的霍德是少数几个集美国国家科学院、医学院和工程院院士于一身的科学家。他并不只生活在实验室中,78 岁

并不只生活在实验室中,78 岁

东风悦达起亚 K3

以实力 造英雄 K3

东风悦达起亚汽车有限公司 全国呼叫中心: 400-799-0000 网址: www.dyk.com.cn